



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
Chinese Rising Star Critics Collection

谭五昌 [主编]

知识人的精神事务
Intellectual's Spiritual Affairs by Yanhong He



何言宏
◎ 著

昆仑出版社

知识人的精神事务

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

何言宏 [著]

ZHONG GUO XIN RUI PI PING JIA WEN CONG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人的精神事务 / 何言宏著,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13.1
(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

ISBN 978-7-80239-014-0

I. ①知… II. ①何…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4045 号

书 名: 知识人的精神事务

作 者: 何言宏

责任编辑: 姜念光

责任校对: 袁 泉

装帧设计: 王 鹏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66531659

E-mail: jfjch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8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239-014-0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言

谭五昌

在文艺领域,批评家这种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很大程度上,某一历史时段文艺的繁荣与健康发展取决于文艺批评的积极参与和深度介入。而新锐批评家,对文艺所起的推动与导引作用更为显明,因为新锐批评家代表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段最为开放与新颖的批评思维。在这里,“新锐”不仅与年龄层面的相对年轻状态相关,更是指一种勇于超越陈旧、锐意创新的批评思维与精神气质。因而,“新锐批评家”可以视为是对一种具有光荣意味或荣誉感的批评家身份的自我指认。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资讯的空前发达与视野的空前宏阔及批评对象的空前复杂化,新锐批评家所秉持的批评使命也显得日益重要。毫无疑问,在当下中国呈现极为活跃态势的新锐批评家堪称文艺批评领域的生力军,整体而言,他们思维敏锐、见解独到、学养厚实、眼界开阔、才识过人,是新世纪最可倚重的一支批评队伍,也是新世纪中国文艺事业极为有力的参与者与推动者。他们的批评实践对当下文艺领域的各个层面均产生着辐射性的影响。

2011 年年底,由我本人发起,并同时联合陈旭光、柳忠秧、李遇春等国内新锐批评家与学者,在广州举办首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我们发起举办这个论坛的目的与宗旨,是为国内新锐批评家们搭建一个开放性的高端学术平台,让大家为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艺术问题“诊断把脉”,建言献策,让批评发出真正的强有力的声音!我们为此次学术论坛提出的口号是:“重塑批评家主体形象,建构新世纪批评秩序。”意欲通过连续举办“中国新锐批评家高

端论坛”，冀望对当下的中国文艺事业产生某种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与正面影响。近三十位在批评领域颇具影响力与非凡造诣的国内新锐批评家出席了首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他们在论坛上围绕着新世纪十年来的文艺现象各抒己见，在坦诚而精彩的话语交锋中不断闪现学术思想的耀眼火花，而新锐批评家的独特形象与个性风采，由此也获得了清晰鲜明的自我呈现。事后，首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得到了学术界及时的应有关注与充分好评。

正是首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的成功举办，成为我编选这套“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的缘起。我的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动机，便是意欲把当下那些活跃而功力深厚的新锐批评家的批评成果，进行集体性的展示。在今年（2012年）年初，我陆续邀约陈旭光、谢有顺、张光芒、何言宏、路文彬、敬文东、夏可君、庄伟杰、刘复生等十位国内知名批评家，加盟本套“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回应积极，并基本按期交来了他们的书稿，在此我要感谢这些批评家朋友对我的信任，由于他们的大力支持与积极配合，这套十卷本的“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才可能成规模地一次性推出，而十位有影响力的新锐批评家也才有可能得以集中亮相。

这套“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由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十位新锐批评家（名单前面已提及）的十本批评文集构成，每本集子均是每位批评家近些年极为满意的论文的汇编，很大程度上，这套“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可以被视为此十位新锐批评家具标志性的文艺批评、文化批评与研究成果的精华性展示。这套文丛以近一二十年来的文艺创作（具体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影视、绘画、海外文学等），文化现象与问题，以及当下文艺批评状况等为探讨对象和研究范围，所谈论与探讨的学术话题极为广泛，几乎涉及当下文艺及文化批评的各个层面。作者们以敏锐自觉的问题意识切入各自的言说话题，坦率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各自书中多有精彩言论，充满真知灼见。此外，丛书的每位作者均在自己的著作中鲜明地展示了自身的学术兴趣与研究特长，而且还在自己的文字中呈现了自己独特的批评文体与批评个性。由于这套文丛内容极为丰富乃至驳杂，要想在这里对每位作者的论著做具体阐释与评价，显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我就不多置喙了，留待高明的读者去做具体评判吧。总之，这套“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的推出，应能引起批评界与学术界

的关注与重视。

最后,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我非常感谢昆仑出版社有关领导和该丛书责任编辑姜念光先生,他们的大力支持及其过人的学术眼光,让这套丛书得以顺利问世。出版机构对学术事业的无私襄助,无疑是我们这些批评家继续从事文艺批评与学术研究工作的切实动力之一。

是为序。

2012.8.7.凌晨(立秋日),于甘肃兰州旅次

序言 谭五昌

第一辑 文学史重省

- 002 精神权力的瓦解与重塑
017 当代中国的见证文学
038 “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
052 为什么要鼓吹忘却?
059 现时代的中国书写
073 中国当代文学的自主性难题
077 中国当代文学自主性的建构
087 近年文学的民间意识与文化政治问题
094 坚持一种批判的地方性
099 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的中国当代文学
106 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

第二辑 作家作品论

- 114 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
118 精神创伤与美的救赎
127 重新“归顺”于对“人”的关切
136 权力批判中的道德诫命
144 叹息与呐喊

150	书写我们的核心经验
156	精神乡邦的眷顾与坚守
165	“花儿的野腔把人迷……”
167	天空宽广到何时,天空宽广到何地?

第三辑 文学批评论

172	陈思和教授的学术世界
188	批判的学术如何可能?
203	发现者的激情与尊严
216	“诗歌标准”的焦虑及其他
221	“重写诗歌史”!
227	“边缘”的意识形态
232	诗歌史的写法
236	深入历史与介入现场
240	深入现场与发现问题
245	文学批评的反思与重建
255	介入的批评
257	为价值而学术
260	学术风度与批评精神
263	我们最切要的批评精神
266	批评的经典化
268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专业性问题的反思

第一辑
文学史重省



精神权力的瓦解与重塑

何谓精神权力？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谈论权力,特别是谈论精神权力,又尤其是以知识分子精神权力的重新塑造作为主要的关切来谈论我们的文学,似乎已经是一件不合时宜、过于高调和非常可笑与可疑的事情。我之所以执意如此,是因为我相信,任何一个民族在任何一个时代的精神世界,都不可能真正地平均化与同质化,总有一些相对独特的个体或群体,会在精神上不同于广泛的大众,从而在他们与大众之间,以及在这些相对独特的个体与群体之间,形成复杂的精神张力,在精神政治学的意义上,这些复杂的张力实际上就是权力关系,是不同的精神实践之间的冲突、融合与紧张。作为一种重要和独特的精神实践,“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在整个中国的精神空间和我们这个民族在“文革”后的精神历程中也有着非常重要和独特的意义:一方面,它是我们这个民族中的一个相当独特的群体即文学知识分子的精神表达,某种意义上,它不仅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文革”后的精神历程及其所达到的精神高度与精神深度,同时也很必然地包含和暴露了一定的精神问题,体现着某些不容忽视的精神症候;另一方面,它对我们的民族精神也有着或者是积极、或者又是十分消极的精神影响;它是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又与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呈现着或者是同构,或者是共振,或者又是游离、引领、介入与批判等相当复杂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想从文学实践与精神生活之间关系的角度,梳理与反思一下“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在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中是如何从“新时期”之初精神权力的重新塑造而遭到逐步瓦解的?并且在相对乐观的意义上,还想对这一遭到瓦解的精神权力如何重塑、如何重振与复活提出初步的思考。

所谓的精神权力,是一个相对于世俗权力而言的概念和说法。1881年1月,俄罗斯思想家索洛维约夫在悼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次演讲中,曾经以这样的说法来高度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俄国社会的精神意义,认为在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恶的斗争中存在着“世俗的”和“精神的”两种权力:“世俗权力是以恶制恶,用惩罚和暴力与恶斗争,仅仅维持某种外在的社会秩序。第二种权力——精神权力,则不承认这种外在秩序表达了绝对真理,执意通过内在的精神力量,也就是使恶不仅受制于外在的秩序,而是彻底臣服于善,以实现绝对真理”,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认为“就像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总是集中在一个人——国家元首身上,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力,在每个时代一般在全体国民中也只属于一个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意识到人类的精神理想,比任何人都更自觉地追求这些理想,比任何人都更强有力地用自己的言论影响他人。这样的精神领袖对俄罗斯人来说,在最近一段时期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①

实际上,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当时的俄罗斯人来说,伟大的托尔斯泰同样也是他们的“精神领袖”。1908年,在一篇纪念托尔斯泰八十寿辰的文章中,俄国诗人勃洛克就曾经用“俄罗斯上空的太阳”来形容托尔斯泰,认为“只要托尔斯泰还健在,还跟在自己那匹白马后面扶犁走在垄沟上”,那就表明太阳还在运行,俄罗斯人民在面对被勃洛克称为是“吸血鬼”的暴政与恐怖时,也就不怕。因为在勃洛克看来:“全体俄罗斯公民,不管他们的思想、派别、信仰、个性、职业有什么不同,大家都曾在吸吮母亲乳汁的同时,或多或少从他那伟大生命力中汲取过力量”,正是托尔斯泰“用自己的肩膀支撑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用自己的快乐滋养和供给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正教行政总署禁止我们高兴,这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的忧愁与快乐与其毫无关系”。^②

正是由于他们强大的精神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都被当时的俄罗斯人所爱戴,成了他们的精神凭依和精神资源,因此也成了拥有着巨大

^① 索洛维约夫:《一八八一年一月三十日在高级女子讲习班悼念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索洛维约夫等:《精神领袖:俄罗斯思想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2月版。

^② 勃洛克:《俄罗斯上空的太阳》,《知识分子与革命》,东方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的精神影响力和精神权力的精神领袖。实际上,对于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来说,精神领袖往往并非如索洛维约夫所说的“只属于一个人”,而可能是双星或双璧,或者像一位专门研究中东欧知识分子的法国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包含着“灿若群星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团体。^①如果看一下我国,比如在五四时期,当时的精神领袖实际上也是由陈独秀、鲁迅和胡适等人构成的精神团体,他们启蒙主义的精神实践对于我们这个民族走出封建主义的精神蒙昧,无疑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特别是对其中的知识分子来说,虽然迄今为止,其中的鲁迅都更被认为是一位“最杰出的精神领袖”,^②但在当时,精神领袖的团体性特征确实也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再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反思一下“文革”后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程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道路,特别是再将这样的思考联系于“文革”后中国的精神现实,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虽然没有像索洛维约夫所说的那样,有一位“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意识到人类的精神理想,比任何人都更自觉地追求这些理想,比任何人都更强有力地用自己的言论影响他人”的拥有着“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力”的“精神领袖”,但却曾有着一个同样“清晰地意识到”并且“自觉地追求”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理想,同时也像五四先驱那样承担着启蒙使命的“精神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一个个体虽不是太阳,但却像是星辰,共同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领袖”。恰正是他们,曾经以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的光芒照彻了我们的生存,给我们以巨大的精神影响与思想启迪,这就是“文革”结束之后至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者。

精神权力的塑造

正如五四时代的中国开始走出封建蒙昧一样,“文革”后的中国也开始走出“文革”时的蒙昧,出现了普遍的精神觉醒,而在其中,又以启蒙主义的文学实践最具先觉,最为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精神感召力。这一点,正如当时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李泽厚在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中所指出的:“物极必反。历史终于翻开了新页,十亿神州从‘文革’噩梦中惊醒之后,知

① 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欧洲精神》,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8月版,第8页。

② 李锐:《谁的“人类”?》,《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

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一代(即‘红卫兵一代’)的心声就如同不可阻挡的洪流,倾泻而出。它当然最敏感地反映在文艺上。”“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相当朦胧;但又有一点异常清楚明白:一个造神造英雄来统治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回到五四时期的感伤、憧憬、迷茫、叹息和欢乐。但这已是经历了六十年惨痛之后的复归。历史尽管绕圆圈,但也不完全重复。几代人应该没有白活,几代人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使它比五四要深刻、沉重、绚丽、丰满。”^①在启蒙主义的意义上重新复归五四而又比五四更加绚丽、丰满、凝重、深刻和复杂,是李泽厚在观察 1980 年前后的中国文学并且将其与五四时代的启蒙文学相比较后所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他对当时文学的高度评价。但在当时,由于“文革”后的中国文学还未能够充分地展开,时间距离的过于切近和“一瞥性”的思考方式甚至专业归属的差异,都使李泽厚尚难以对当时的文学作更深入地思考与研究,也未及对其所隐含的精神局限与精神问题作出批判性的反思,它在后来所遭到的多方面的瓦解或失败,显然更难有预见。

不过,上述问题并不影响李泽厚对当时文学启蒙精神的准确揭示,以其启蒙思想家的身份和影响,这样的揭示,倒更是使得当时的文学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和思想文化史中启蒙主义的精神形象和精神价值得到了非常鲜明的突出和双重性的历史定位,使得它与现代以来启蒙传统的精神联系更加明确。这也正如一位论者所指出的,由于“启蒙思潮及其社会实践在近代以来是作为一种权力话语或轴心价值而影响于中国文学并支配了几代文学者的写作方向和道路选择”,^②在整个的 1980 年代,这种“支配”与“影响”又一次显示了它的力量与深刻,使得在当时中国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或精神空间中,文学知识分子的启蒙实践也像它在五四时期一样,不断取得激荡人心和相当巨大的精神突破,它不仅创造着“时代的权力话语或轴心价值”,^③同时也塑造和

① 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年 1 月版。

② 吴俊:《困难的关系:当代文学与国民性问题》,《文艺研究》2009 年第 10 期。

③ 吴俊:《困难的关系:当代文学与国民性问题》,《文艺研究》2009 年第 10 期。

形成了一个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和精神影响力即精神权力的精神团体,“文革”时期几乎全军覆灭和被彻底瓦解的知识分子群体重又聚集,又一次实现了自己的精神复活。

1980年代,文学知识分子以其启蒙主义的精神实践建构与形成的精神权力主要依赖于他们启蒙主义的话语实践,这样的实践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政治启蒙;二是思想文化启蒙。社会政治启蒙主要体现在“伤痕”、“反思”文学、“朦胧诗”及一些“改革文学”作品中,批判与反思1950—1970年代中国被认为是“左”或“极‘左’”的社会政治实践,同时在“经济改革”的层面上想象一种更加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社会政治“建制”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对于1950—1970年代中国的历史错误,当时的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都有着基本一致的共识,认为“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①“伤痕”、“反思”文学中的很多作品和“朦胧诗”中诸如北岛的《宣告》、《结局或开始》、江河的《没有写完的诗》、芒克的《葡萄园》、《阳光中的向日葵》和梁小斌的《雪白的墙》等等,都曾经从不同的方面批判与反思“大跃进”时期的冒进与荒唐及“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罪愆;而在“改革文学”中,现代化的未来想象和对当时在城市与乡村蓬勃展开的经济改革的现实关切,使得像蒋子龙、柯云路和张洁这样“改革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和张贤亮、李国文、高晓声、陆文夫、何士光、贾平凹、张炜和张一弓等人的很多“改革文学”作品着力书写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形成了它们以“改革/反改革(保守)”的二元冲突为主导的话语模式和叙事模式(如《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即使像《陈奂生上城》和《乡场上》、《黑娃照相》等未曾书写“改革/反改革”正面冲突的一些作品,实际上也隐含着“改革前”与“改革后”的对比模式,以此来歌颂当时的改革路线,为当时主导性的社会政治实践即经济改革进行话语辩护和文学“论证”。

在思想文化启蒙上,启蒙主义的话语重点主要在人道主义和国民性批判这两个方面。当时的人道主义话语虽然像李泽厚所说的“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在“人

^① 邓小平:《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的解放”方面与五四时期着重于将“人”从封建性的宗法制度及思想意识中“解放”出来非常相似,但这种相似却又有着本质的不同。五四时期“人的解放”主要是“反封建”,而1980年前后的人道主义所批判与反思的,却主要是“左”,是“左”所导致的历史灾难对于人的压抑、剥夺与戕害。如果我们充分认识到所谓的“左”及其所导致的社会政治实践其实具有着现代性的本质,那就会进一步明确,这种批判与反思实际上还是发生于现代性的内部,在话语结构、话语功能、历史意义及历史局限方面具有不同于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的历史新质,人道伦理的重建和人道政治的关切是其中的主要内容。“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的“革命伦理”践踏人道,整个社会甚至婚恋、家庭、友谊与血亲之间的伦理关系都被严重异化,“阶级化”与“革命化”严重扭曲甚至取代了基本的人道伦理,像卢新华的《伤痕》、郑义的《枫》、刘心武的《如意》、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方之的《内奸》、李国文的《月食》、宗璞的《三生石》、冯骥才的《啊》、陈建功的《轱辘把胡同九号》和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等很多作品,都在人道伦理的话语立场上批判了这种异化现象。与此相应,“十七年”时期的“左”倾政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的“革命政治”对于人的基本权利的侵害,当时的很多作品对此也作了相当充分的揭示与批判,而且这些揭示与批判的重点,主要是在于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这两个核心权利^①的被侵害与剥夺。在对人的生命权利的关切方面,巴金的《随想录》、古华的《芙蓉镇》、刘心武的《如意》、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公刘的《刑场》、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和北岛的《宣告》与《结局或开始》等,都批判了“文革”之中“革命政治”的种种暴行,声张与捍卫着生命的权利;而在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陆文夫的《美食家》和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中,“食”、“性”与“住”这些生命的基本欲求都被“革命”所剥夺,宗璞的小说《三生石》中的“革命政治”,甚至将批斗搞到了病房,阻止和剥夺了对身患癌症的“反动人物”梅菩提的有效治疗。至于对人的自由权利的话语伸张,像刘心武的《穿米黄色风衣的青年》、张抗抗的《夏》、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笑天的《公开的内参》和陆文夫的《美食家》等作品在人的生活方式的自由方面、古华的《芙蓉镇》、陆文夫的《小贩世家》、高晓声的《“漏斗户

① 保罗·库尔兹:《保卫世俗人道主义》,东方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43、78页。

主”》、李宽定的《小家碧玉》和锦云、王毅的《笨人王老大》等作品在人的经济自由方面、戴厚英的《诗人之死》和《人啊，人》、史铁生的《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冯骥才的《啊！》和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等作品在人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方面，都对“左”或极“左”的所谓“革命政治”对于自由的剥夺作出了批判，伸张和捍卫着人道的政治。

像人道主义的话语实践一样，1980年代的国民性批判话语也有着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历史性变化，其中，尤其以高晓声的一系列作品对于农民灵魂的刻画表现得最为突出与深刻。高晓声所揭示与批判的，不仅有“国民劣根性”中的“看客心理”，更有其中的“主奴根性”，而且这种“主奴根性”还具有了新的历史内容，这便是他所概括与批判的“跟跟派”——“几千年来，农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信仰，他们找到的并不多，无非是神仙和皇帝。结果都失望了。后来找到了共产党，他们很高兴，有许多事实证明他们是找对了，于是就把共产党作为偶像来崇拜。他们找到一个崇拜的对象实在不容易，一旦建立起来就很难动摇。所以，即使党执行了错误路线，他们照样崇拜”，他们“相信共产党，这种信仰是坚实的，他们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在党的路线发生了错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照样跟着走”。^①从鲁迅到赵树理，国民性批判的一个基本特点，就在于他们是将“国民劣根性”作为封建主义的精神遗存来批判的，而且这种批判往往还联系于封建主义的宗法制度，在鲁迅与赵树理之间，国民性批判的基本走向，便是认为随着封建主义的制度性溃解和新制度、新政权的建立，我们的国民性中必然会生长出一种新的更加健全的精神性格，而高晓声的创作，却很有力地解构了这种乐观的想象，揭示出在1949年以后新的制度中“国民劣根性”所表现出来的新的形式，显示出他异常的深刻。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在社会政治启蒙，还是在思想文化启蒙方面，当时的文学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启蒙实践中都有着非常自觉和十分明确的历史意识，批判性地反思刚刚结束的历史时期（“十七年”与“文革”）和其中广大民众的精神、命运与生存，并且将这种批判与反思建立于新的历史基点（“新时期”）和已被规划的历史性的未来（“现代化”），是这种历

^① 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始末》，《中短篇小说获奖作者创作经验谈》，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史意识主要内容。在这样的历史意识中,“共产主义”这样一种高远宏大的历史目标和未来想象退缩或降格为“现代化”这一更加务实的历史规划,这样的规划,也是索洛维约夫所说的我们这个民族当时几乎共同的“精神理想”,“新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充分反思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努力实现这样的规划与理想,这也是当时的中国最具共识的历史自觉,文学知识分子的启蒙实践正是这样的努力与自觉,是一种非常自觉的历史实践,启蒙话语的精神力量,也正源乎于此。在我们这个民族十分自觉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实践中,将自己的实践同样自觉地紧密联系于它们,是1980年代文学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与我们这个民族高度共振的主要原因,文学因此也担当着精神感召和精神引领的历史重任,非常有力地介入和影响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精神性的权力便所由生。

精神权力的瓦解

当我们今天重新检讨1980年代文学知识分子的启蒙实践时,不仅应该肯定他们与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生活的高度共振和深刻联系,肯定他们的精神力量和因此而具有的精神权力,同时也要看到,他们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精神局限与精神问题,而且,正是这些局限与问题形成了启蒙文学的精神力量后来遭到逐步瓦解的重要原因。

所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80年代文学知识分子启蒙实践中的历史意识实际上并不彻底。一方面,他们对1950—1970年代中国历史的批判与反思并不全面,也缺少应有的彻底与深刻,这不仅表现在诸如其中的“土地改革”和“肃反”等很多历史运动尚未得到书写与反思,更表现在他们的思考很难超越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些五四时期便曾被忽略的诸如“天赋权利”或“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等西方启蒙主义话语,^①以及一些形而上层面的宗教信仰话语,很少被引入到对当代历史和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与命运的思考,即或偶有这方面的努力(如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往往也会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严厉批评,从而使类似的写作难以为继。^②当时,启蒙主义的文学

①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

② 有关讨论请参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